

和30位作家聊天：关于写作、阅读、童年及其他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作为读者，很可能有过这样的想象：搬两把椅子，与作家相对而坐，目光是平视的，聊天是自由的。作家是作家，更是一个浸润在人间烟火里的普通人。

《文学的现场——作家说》一书，收录了我与30位作家的访谈文章，均曾发表于《中国青年报》“作家说”专栏，正是对以上想象的实践。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，成名已久的作家与崭露头角的作家，都聚在了这个熙熙攘攘的文学现场。

这里的“现场”有几层含义：一是空间，作家笔下的文学根据地，他们的故乡与居地，乃至访谈发生的地点，都构成文学地图的一个个标记点；二是时间，作家作品记录的年代，他们本人的童年与当下，都是流动而鲜活的；三是时空之外的种种集合，可能是一种情绪，可能是一种观点，让这个现场或许能建构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完整世界。

作家领路，打开文学的地图

很多作家笔下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根本地，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、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、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。在《文学的现场——作家说》中，作家领路，他们的文学地图被徐徐展开。

徐则臣的人生轨迹是一路“北上”，小时候生活在水边，18岁上大学又在运河边，20多年来，他写了很多关于运河的小说，比如“花街”系列，比如《北上》。第一次写花街，这就是一条南方典型的青石板路，几十户人家，门对门开着；后来再写，人物和故事放不下了，这条街就越来越长。有人问，这条街到底有多长？他答，这个世界有多复杂，它就有多漫长。

刘亮程出生、成长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，凭借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而被称为“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”。他8岁时，父亲就不在了，母亲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艰难度日。而当他成年之后回忆童年，一切苦难竟然都被化解了。他说，童年一场一场的风、一夜一夜的月光和繁星，草木，虫鸣，一个少年在村庄里无边无际的冥想和梦，为他写作中最重要的东西。

梁晓声说，作家永远写的是“他者”，于是也就成了时代的书记员。石一枫说，新文学的基因在于它的批判性，从鲁迅、茅盾，到巴金、老舍，这种基因一脉相承，抹杀掉这个特质，就不是新文学了。



因此，书中有文学记录，也有文艺批评。而对作家来说，最终的文学地图是“中国”。

作为报告文学作家，何建明笔下的“现场”是文学的，更是社会的。从20世纪90年代揭露中国矿产资源危机的《野性的黑潮》、讲述贫困大学生问题的《落泪是金》、全景式描述高考的《中国高考报告》，再到《国家行动：三峡大移民》《非凡十年祭·北京保卫战》《爆炸现场：天津“8·12”大爆炸纪实》等重大事件，约70部报告文学作品，是对中国40余年的观察。

小时候读的书，为孩子写的书

每个作家都曾是孩子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，童年、成长、梦想……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。他们小时候读的一本书本，长大后为孩子写的一本书本，都隐喻着阅读的生生不息。

刘心武称自己小时候是一个“狂妄的文学少年”，12岁上初中后就觉得自已长大了，要看《人民文学》《译文》。1958年，16岁的刘心武写了《谈〈第四十一〉》，给《读书》杂志投稿成功，编辑以为他是一个老先生，居然来评论这么一本冷门的苏联小说。

张炜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海边，海边有成片的防护林。那时候的孩子，在林子深处突然遇到一个老婆婆，会怀疑她是不是妖怪变的——这种冒险的生活就是

童年。无数的故事已经被张炜稍加改编写进了作品里，但仍然有许多没有写过。

在很多作家的讲述中，童年对阅读的渴望，历历在目。

陈彦小时候生活在商洛的山里，家里没有多少书，大概10岁时才读到了第一本比较“大”的书《高玉宝》。后来到县城工作，陈彦住在宿舍，床上靠墙码着半人高的书，晚上就睡在书堆边。

付秀莹小时候，村子里连有字的东西很少。邻居家窗台上放着一本杂志，可能还用来垫过酱油，她就站着津津有味地看。高中时，付秀莹在报纸上发表作品，收到很多读者来信，与她探讨对写作的看法、青春的苦恼，但她还在愁数学。

徐则臣小时候在农村，看的很多书是传来传去的，早就没头没尾。很多年之后才知道，哦，那是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……他看的第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长篇小说是《围城》，小时候每个假期都会重新看一遍。不过，徐则臣“进步神速”，到小学五年级，已经把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了。

而以解读金庸小说为人熟知的六神磊磊，初中才开始读金庸原著，看的第一部是《神雕侠侣》。时过境迁，金庸武侠已成经典。六神磊磊说：“流行文化无法取悦每一代人，如果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，它就消亡；如果经受住了，它就成为经典。”

作家在为孩子写作时，往往有明确

的站位和价值取向。他们深知，童年时期的阅读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

肖复兴小时候喜欢读现实主义的小说，比如瓦尔特·本雅明的《驼背小人》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《一生的故事》，觉得自己所认识的现实生活接近。很多年以后，他在少年成长小说《兄弟俩》中回望自己的童年。他并不希望孩子只读儿童文学，他认为，挑选一些经过时间筛选，值得信赖的成人文学作品去读，是十分必要的，“阅读层面需要贴一贴脚尖、蹦一蹦高”。

这30位作家中，在孩子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要数沈石溪。被称为“动物小说大王”的他，40多年写了70多种动物，他笔下的故事，从不回避“丛林法则”。沈石溪认为，高年级孩子阅读的小说，应该有限度地接触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社会。

孩子读什么，没有唯一答案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正如沈石溪所说，书中始终要向孩子们表达的主题是：美好的东西、生命的力量，不会随着个体被消灭而烟消云散，它会变成一种精神上的基因，代代传承。

作家来来往往，你我亦在其中

跟随作家的作品徜徉过文学的地图，也跟随作家的记忆回溯过童年的阅读，最后，还有一块作家的“自留地”，可能是读者日常接触不到的。书中，那些无

关文学、有关生活的话题，让“现场”的氛围感更浓郁了。

“斜杠青年”可能是个新词，但“斜杠”似乎是任何年代作家的常态。比如，20世纪80年代的“先锋作家”马原做过记者、编辑、教授、商人；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童年路内，做过化工厂工人、仓库管理员、广告公司策划；刘庆邦当过农民、下过矿井；刘亮程开过农机配件门市部和酒吧……

看来，作家的日常和我们一样，没有“主角光环”，一直在尝试，在挑战区与舒适区之间徘徊。余耕曾自诩是打篮球里小说写得最好的，但不巧有一天遇到了冯骥才先生，没错，即便在这30位作家中，除了写作之外的行当，作家们也能“卷”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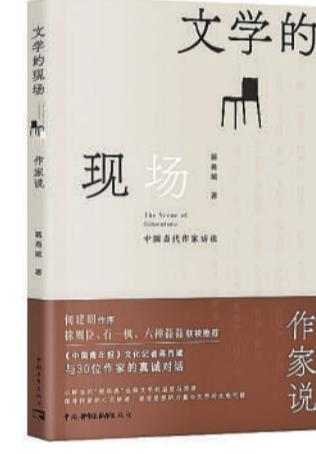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在写作之外的“闲趣”，与他们笔下那些文学的爱恨情仇、那些历史的悲欢离合，搭配参照，碰撞出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现场。

叶广芩爱吃，只要出门，就必须找地方特色尝尝，什么时候吃什么呢，比如春天的香椿正当季，搁点儿盐、醋、香油，再不放别的；陈彦是一个天文爱好者；邱华栋练习武术，喜欢极限运动；李修文喜欢树，一棵苗木多少钱买进来、苗圃里养几年出圃能卖多少钱，他一清二楚。

徐则臣回忆，大学毕业后他成了“北漂”，在杂志社做编辑，一开始一个月工资1500元，房租就要花掉1100元。那时候特别向往的，就是每周或者每两周一次，到人大西门外一个小馆子吃重庆水煮鱼，“豆芽在用过无数次的油里煮过，特别入味”。

年轻，似乎天然包含一种乐观主义，从来如此。

“作家访谈”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一位作家和他的部分作品，而我更希望的是，阅读能成为日常，作家来来往往，你我亦在其中。



阅读观

文学的品质与“破圈”并不相悖。

□ 王钟的

“董宇辉也配拿人民文学奖？”最近，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，知名网络主播董宇辉获“传播贡献奖”。一时间，这一消息在关心文学的人群里炸了锅，不少人指出董宇辉直播时多次出现文学常识错误，其个人文学素养不容乐观，人民文学奖这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向董宇辉“屈尊”，实在不应该。

纠结董宇辉文学水平究竟几何，实在是偏离了讨论的靶心。人民文学奖对董宇辉的得奖理由说得清清楚楚：“董宇辉以直播间为舞台，助力创刊七十五年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，以‘寻亲’之名，实现与广大读者的‘双向奔赴’。”

如果说上述充满文学修辞的包装还是如坠云雾，那么列举下面的数据一定能让人恍然大悟：董宇辉曾两次帮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直播卖货，2024年1月的一次直播，在4个小时内卖出8.26万套，99.2万册，成交金额1785万元。

当时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表示：“直播结束后，线上销售额还在不断增加，截至1月24日下午4点，已经达到120万册了。对比2023年的发行量，这大约是我们两年的销量。”

对于传播推广《人民文学》来说，董宇辉的贡献可谓是“功德无量”了。此次，人民文学奖把“传播贡献奖”颁给董宇辉，并不是夸他的文学造诣有多高，而是回馈董宇辉为杂志销售作出的实质贡献，也可能是在表达对“董宇辉们”的期待——希望更多掌握网络话语权的“大V”给文学推广一把力。

对此，可能还是会有人批评人民文学奖不够“矜持”，把对于传播者的感谢和文学的褒奖混在一起，甚至有一些因人设奖的嫌疑。但是，凭什么认为人民文学奖对文学的判断力出了问题，却未免有些不顾事实的清高。

文学是需要传播的，没有传播力的文学作品，很难称得上是好的文学作品。作为商品的文学出版物，更是需要营销的。不光是出版机构把营销作为重要工作，很多时候，作家本人在写作阶段就会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，考虑作品的销路。那种认为文学就应该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，甚至认为文学主动接近市场就是“堕落”的想法，实在是一种迷思。

如今，网络已经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营销渠道。董宇辉在网络直播间一呼百应，让观众乐意掏钱购买，创下多个文学作品的销售记录，就是生动的证明。衡量一个人对文学传播的贡献，当然要看他在网络传播中的贡献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在文学网络营销的时代，把文学作品“卖出去”是否就等同于有效传播呢？答案可能就不那么绝对了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“情绪价值”而购买，也不知道那些增加的销量到了消费者手里，有多少被认认真真翻开阅读。

当然，对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与董宇辉倒也不必苛责。抱着善意的眼光，就算最终打开杂志的只是少数人，那也是促进了文学的传播。开卷有益，就算不是每一篇小说、每一首诗都被认真真读完，只要有只言片语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记，文学的版图就实现了拓展。

但是，要意识到文学出版物的特殊性，就是文学出版物既是一种商品，也是一种具有传播属性的文化形态。从本质上讲，它的传播力来源于和读者的连接，来源于内容本身。文学出版物通过直播营销打开销路，固然有助于强化其商品属性，但还需要回应如何维持和扩大传播属性的问题。

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从来都是在市场运作与读者选择的共同作用下“双向奔赴”。好书就是让人想看、爱看、手不释卷，以内容为本拓宽销路。有一个段子时常被人引用，“余华靠《活着》活着”。作为销量达千万级的作品，《活着》当然给文学如何真正接近读者提供了一个范例。

具体到每一部文学作品，固然有高雅与通俗之分，有取悦于自我和取悦于读者之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小圈子化、排他化，那种“我写的是严肃文学，读不懂是你的问题”“文学作品销路不好，是因为时代太喧嚣”的腔调，非但不能体现文学艺术的品位，反而暴露写作认知的狭隘。

文学的品质与“破圈”并不相悖。为了更好地连接读者，文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当中。比如，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探索“中间文学”，让“严肃文学”不等同于严肃的文本，而是用精彩的故事、通俗的技法，表达作者对于社会问题思考的“严肃”。

随着信息环境和主流媒介形式的变化，文学是否仍以纸质印刷品为主要传播渠道，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。这不仅意味着要把文字搬到网上，也可能意味着文学与更多媒介形式紧密结合——让人在影视、音乐、短视频中“读”到文学，感受文学的魅力。

其实，直播能够让杂志“续命”一时，却不足以扭转读者变化了的阅读习惯——董宇辉第二次直播卖《人民文学》的业绩就远不如第一次了。在人民文学奖“传播贡献奖”的颁奖词中，有个表述可谓切中要害，“融入现代传播格局”。对此，无论是文学写作者，还是文学的出版者、传播者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努力。

董宇辉是否得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文学如何接近读者

人物

石一枫：“命运的偏差”是最大的悬疑

漫天大雾里徘徊。

一桩案件，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他们强硬地面对生活，演绎出别样一番惊心动魄。

日前，《借命而生》作者石一枫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。他觉得，这部作品在讲述“命运的偏差”这一主题。

“所有人命运都出现了偏差，跟他想要的都有偏差：杜湘东刚开始想当英雄、徐文国不想当逃犯、刘广才最大的理想是当厂长……”《借命而生》中，没有人的命运与初衷吻合。石一枫想写的是：当命运发生偏差后，每个人又选择如何面对？

命运的偏差，成了电视剧《借命而生》最大的悬疑。

石一枫曾以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，近年的《地球之眼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等也赢得文学界的关注与读者的喜爱。

□ 韩浩月

练笔记

写作是一场梦境

许多著名作家在讲述写作奥秘的时候，会强调“写下去”“只要写就有可能”“除了动手去写，没有技巧可言”，对于成熟作家来说，这是“正确的废话”，因为他们无论怎样，只要写，确实能写出作品、写出成果、没准会压榨出杰作，但对于学习或者进步阶段的写作者而言，这样的鼓励有时有用，有时则会带来茫然。

作家们的写作，和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不停喝着咖啡或酒水，要站在书桌或柜子边才能写出来，要开车到荒郊野外去写……为了写出好的作品，或者说为了保持写出好作品的上佳状态，作家们愿意去满足自己的癖好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，只为换来笔下的欢快。但状态是什么？是投入、沉静，还是兴奋、狂热？是外在的表现还是内在的沸腾？找到写作的状态很重要，可以说状态的良好程度决定了草稿的精彩程度——同样的题目，在不同的时间段写下来，会得到不同的文章，在不同的状态下写出来，更会不一样。

和朋友聊天，说到音乐会，舞台上的演奏家们凑在一起，静静等待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挥起，观众们也在屏住呼吸等待第一个音符的响起，这个时候，剧院的灯光，指挥家的胳膊，演奏家们的姿

芬芳，成为剧中一个重要角色；原著中以“为了显示受工伤，整天缠绵布的保卫科科长”这一形象的角色，在剧中成为被赋予考大学、学英语，“无法单纯衡量对错”的复杂角色刘广才，令石一枫本人都感到唏嘘。

“越是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个小人物，他的一生其实也是在自己的命运中乘风破浪的。”在《借命而生》中饰演保卫科科长刘广才的演员张晶伟对记者说，他看完石一枫的小说感慨良多，“每个人都自认为是自己生命的舵手，但实际上等你真正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这不是我们想去的那个目的地，原来我们一辈子都到不了。”

小人物的命运裹挟中藏着厚重的时代印记。命运或许无法战胜，但在每一次错位与抗争中，普通人早已写下自己的史诗。

石一枫表示，《借命而生》话题比较沉重。透过电视剧，观众会看到一个人跟自己较劲、跟别人较劲、跟整个时代较劲，在他眼中这是宝贵的。

有意思，也更有味道。

气势和情绪，也不能滥用，当觉察到它们即将“暴雨将至”时，也要学会控制，写字和练武一样，如果不加科学的控制，就会走火入魔，写出一堆怪力乱神来。是的，写作是需要力气的，所谓内力的形成，就是自身写作素养和面对素材产生碰撞后的本能控制能力，对于字词的调遣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，但事实上就是写作功底在无形地发挥作用，在进入实质写作阶段后，对于文字的控制力要加强，不要任由气势的冲刷和情绪的宣泄，要写七分留三分，要讲究单个字词的精准度，不要担心在局部较长时间的停留，因为停留本身也是在打磨与思考，为后更好的表达寻找出路。

怎么讲出内力？这个仿佛很难，每位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内力秘诀，他们用最简单的说法“写去吧”“只要写就好”来鼓励别人，因为他们知道内力无法被讲述，那是属于一个人生命体验的隐私，虽然他们有时也想竭力用简单的话语说出写作的秘诀，但最深层的写作秘密却

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作品里“看出人生，看到匆匆而去的时光”。

在《借命而生》热播之际，石一枫发布了新小说《一日顶流》，又是另一种“时代观察”——写出当下时代中流量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和精神困境。

《一日顶流》讲述一个普通人意外成为“顶流”，通过个人故事，勾连中国互联网生活的前世今生，以及两代人命运的兜转起伏。

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的身份，而近几年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新身份——网络身份。比如你有网名，有‘人设’，有‘赛道’，再比如网络身份也有不同的地位，比如你有多少粉丝，多少流量，多大影响力。这是附加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的另一重新身份，也是新生活、新事物。”在这部小说中，石一枫想阐述“命运是荒诞的”这一主题。

文坛评价，石一枫总选择写小人物，而且是“体现大时代、大问题的小人物”。

在石一枫看来，如果想写好一个人，就一定会把一个时代的环境和现实写出来。“时代变化很大，一夜之间就能有剧烈的变化，也许一夜之间就能成英雄。”

是不可说或者无法被清晰表达的，因为那并不是技巧